

#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六十三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编者的话：**著名文革史学家王年一老师因病逝世，从此中国史学界痛失一位标志性人物。

为纪念这位《往事》的老朋友，我们将他的一次谈话摘录登出。遗憾的是，王老虽已谢世，我们对他的言论也只能“摘录”——这就是我们身处其间的现实环境，王老在天有灵，当能谅之。

在本次谈话中，王老涉及到两个启发性的问题，一是理论何以成立，一是历史的必然性。他敏锐地抓住了理论的本源问题：“没有实践就没有理论”。这不但触及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触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阿基里斯之踵。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结论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十八、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前者是思辩的，后者是实证的，后者是基于价值判断的乌托邦。

问题在于，如何从资本积累中推论出剩余价值学说？如何从私有制的运行中推论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如何从资本主义矛盾中推论出实行共产主义的未来？

黑格尔曾说，密纳瓦的猫头鹰只有在夜晚才开始飞翔。他的意思是说，只有当历史成为过去，才能有对历史的哲学陈述。也就是说，哲学只提供解释。

但马克思却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但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于是，事后的解释变成了预先的设计。

正如王老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很笼统的，很原则的，很少的，而且还有些是错误的，带有空想色彩，带有左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生活中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

从经验到超验的一跃仍在书斋之内，而从理论到实践的一跃，却如同从哲学的魔瓶里放出一个巨大的幽灵。从此它四处游荡，给世界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百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与其创始人的理论不仅存在差距，简直就是南辕北辙。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到现在也弄不清楚。王老引证邓小平的话说，我们没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

王老在谈到曾被捧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行为时说：“不要以为有多少大道理在里边。”他是在恢复常识，恢复被各式各样的宏大叙事和伟人神话淆乱的视听。他是在提醒我们，在进行历史叙述的时候，不能只想到“历史的必然性”，毛泽东率性而为的个性，的确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历史。

王老的去世，使我们再无缘聆听他的教诲。但他的著述仍会被引用，他提出的问题仍会被探讨。他活在历史中，他的生命，比压抑他的权力更久远。

## 王年一的一次谈话（摘录）

今年（指2006年），香港一个刊物要我的文章，我开始拒绝了。后来我一想，作为一个文革研究者，文革发动40周年，一点都不表态不好，就想和朋友一起写一篇。可前天我们单位发了一本文件，送到家里，上面印了官方的好多指示，大意讲：不许给国外境外新闻机构写稿，不许在国外境外出书，不许与国外境外的人交往。尽管我不满意，不同意，也没用，我还要遵守，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邓小平讲了很多次，我们没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我认为，

社会主义对中国来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很笼统的，很原则的，很少的，而且还有些是错误的，带有空想色彩，带有左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生活中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理论。后天失调：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受苏联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苏联实行社会主义是抓住两条：一条是计划经济，一条是公有制。在这两条上做文章。

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况下，又碰到了这么一个“伟大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有很多优点，但是也有很大的弱点，自负。他非常自负，非常自信。他对经济理论不感兴趣，承认不懂经济，可是死不认输，所以他用后一个错误来掩盖前一个错误（当然这不是我的发明创造，王若水指出来的）。他的错误不是理论上的错误，理论上他清醒的很，他是故意的，为了他的利益，他的需要。他并不是不知道刘少奇没有搞资本主义，并不是误解。不，他认为“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符合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并不是先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后来搞文化大革命，他先搞文化大革命，然后为了论证文化大革命的正确、重要，来制造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是这么一个次序。

建国以后，本来毛主席很想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根据司马璐的回忆（《中共历史的见证》），他到延安的时候见过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这些小青年说：“中国搞社会主义，就要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有小汽车。”他要让大家过好日子，这个愿望不能否认，延安时代就有这个愿望，这个不是假的。

毛泽东有一个毛病，往往他缺什么就提倡什么，他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正是骄傲的时候他才说这话。

建国以后他就跟刘少奇闹矛盾，就是山西的土地问题，中国的工会问题等等。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本来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说中国缺资本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走不到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应运而生的。从战争年代到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都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一九四九年进了北京城以后，刘少奇还坚持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他在天津对资本家说你们多开几个工厂，剥削有功嘛，大家有饭吃，工人有工做，中国只有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建设社会主义。

从一九五二年起，毛泽东就开始批刘少奇，批周恩来，特别是刘少奇，因为刘少奇提过口号“巩固新民主主义”，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发火了：不但搞资本主义而且还要巩固资本主义？

一九五三年年底，中宣部搞了一个《关于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哲学提纲》，胡乔木他们搞的。毛主席做了大量的反复的修改，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他在《论联合政府》里分析的中国工业多少，农业多少，这些东西都没用。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的来讲还是不错的，改变了旧社会的面貌，毛泽东不满意：“太慢。”

到了一九五七年就提出了一个叫赶超战略，超英国赶美国。赫鲁晓夫要在多少年之内赶上美国，毛泽东兴之所至啊：我们要在十五年之内赶上英国。后来又急了，十五年改成十年，十年改成八年，最后变成三年。有些老同志也在当中起了不好的作用，比如说王鹤寿（冶金工业部部长），三年赶上英国是他提出来的，毛主席同意了。

第二年就提出三面红旗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老人家说了很多胡话，藐视这个，藐视那个，“对马克思也不要崇拜”。在北戴河作的《建设人民公社的决议》中说，“看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为期不远了”！有一种对共产主义的渴望，已经对社会主义不满足了，要搞共产主义。吃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啊，都是他老人家欣赏的，赞成的。根据各方面的研究，毛泽东长期陷入乌托邦的迷梦里，怪

圈里，他从年轻时代就崇拜这个东西，还亲自搞过实验。

刘少奇讲了很多话，对毛刺激很大。刘少奇到家乡做调查，看到老百姓生活这么困难，就动感情地说：“老乡们啊，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对不起你们，让你们没有饭吃！要把这个教训刻在石头上，让老百姓永远记住。”

饿死人的问题。我现在看到的资料，非正常死亡最多的说七千万，最少是一千万，根据人口统计的推算要远远超过一千万，是四千万。就象王若水讲的，这本帐躲不掉的。刘少奇说了句很精彩的话，“人相食是要上书的！”这给毛泽东敲了警钟：你现在不要得意，将来历史会写上一笔的。

你得承认毛主席的权谋是第一流，权术大师，他有的是办法——发起和苏联论战。不是我们的大跃进失败了吗，赫鲁晓夫骂我们，说我们没有裤子穿——我和你论战。论战又不要粮食，不要钢铁，要些秀才（王力、姚臻、吴冷西这些人）就行了。

现在关于跟苏联的那场论战党内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是邓小平说法：总结教训，外国人的事情我们不要多管，到后来是不会有好处的。这话是很客观的，老实说也是很偏心的，是不讲是非的。还有一种说法，吴冷西的，完全是“客观主义”，哪一年开会，哪一年怎么怎么样，没有自己的任何观点，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连邓小平说的话他都没有，还认为我们正确。老的新华社社长啊，就是这种修养。

还有一种说法，比较多的，网上的说法：显然是中国共产党错了。怎么错了？毛泽东要抢苏联共产国际领袖的大旗啊。中国开始论战的时候提出“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你提总路线干什么？提总路线的意思就是你们大家拥护我的总路线，在我的旗下。老人家不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啊，觉得他是后辈啊。这一打打了十年，怎么样？没有成功，失败了。怎么失败了？各国共产党还拥护苏联，我们没有几家拥护，虽然我们给了些钱、东西、粮食啊。相反的，我们把各国共产党搞的一分为二，你比如说巴西共产党，一家一半，一半拥护我们的，小党，我们给加个括弧——马列；不拥护我们的——老党，好象共产党都不信马列了。1966年7月8日毛写给江青的信中说“世界上大部分的共产党都不信马列了”。论战事实上也不会成功，因为好多地方讲蛮理，比如批“和平共处”，和平共处有什么原则性错误啊？还有“九评”中好几评讲过：要肯定个人崇拜，否定个人崇拜那是否定领袖的作用。

论战不成功怎么办呢。再来一个运动，改变大家的视线，改变大家的印象，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想了几年想出来这么个主意。发动文化大革命要干什么呢？算总帐。凡是反对过他主张的人，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他都要清算一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他过生日的那天跟王力、江青讲了一些话，说这场斗争是从建国开始就存在的，一个要搞社会主义，一个要搞资本主义，这种斗争一直到今天（他给他的政敌加个帽子，叫“搞资本主义”，说自己要搞社会主义）。六六年他73岁，要考虑自己的后事了，后事如何，百年之后的名声究竟怎么样？他讲趁他现在还没死，把建国以来的帐统统算一算，究竟哪个对，哪个错。这种想法说的不大好听就是非常狂妄的，什么都不放在眼里。曾经有两个人经过中央批准访问汪东兴。汪是推脱的，说这个问题中央档案馆有你们可以去查，这个问题啊呀记不得了，那个问题当时我就不知道，但是汪东兴说了句真话，他说：“毛主席最大的特点是从来不受任何人的支配，独立见解，独立人格。”很显然他讲这话是有个人用意的，因为外面盛传毛受汪支配，所以他讲这话是摘开他自己，说毛主席不受任何人支配，当然也不受我汪东兴支配了。但我认为这句话讲的很对。毛是何等人物啊？他是不会上当受骗的。所以说江青想骗毛主席那是不可能的，林彪想骗毛主席也是不可能的。放心，他的部署是非常严密的。现在《决议》说他被这个利用，被那个利用都是不可能的。凡是文革大事我们都经过，内情不一定很了解，但是大体都了解。比如搞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开始林彪还勉勉强强的，不大愿意，还和江青吵了一架，江青最终说出来了，“是毛主席叫我

来的，请尊神”，现在档案都在。那个座谈会纪要毛本人修改过的，重要的地方是他改的。再比如夺权，那是他和谁商量的？和林彪商量的啊？没证据。号召夺权是老人家的意思。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家可能没大注意：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的大会。天安门的动员大会是毛主席决定要开的，毛穿上了军装。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讲话是陈伯达起草的，经过毛审阅的，毛提出让林彪在大会上念念，表示军队支持搞文化大革命了。再根据《晚年周恩来》等等回忆，林彪打报告要辞职不干，多次讲过他做接班人不合适，能力不够，随时准备让给别人。这些文献上都有，他多次这样讲，叫人不要喊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这都是有家可查的。

有位朋友提过一个很好的命题。他说：“一九六六年刘少奇和邓小平搞镇压学生那一段很可以拿来研究，这又是反右派，打击面之广是很厉害的。”我觉得他提的这个题目很有水平，没有人研究过，因为看在刘、邓的面子上不好研究。其实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学部）近代史研究所编了一本书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很厚一本。在那本书上资料非常的全，他在那个学校讲，这个学校讲，确实是杀气腾腾，所以后来毛那么愤怒也是有来由的。不少人都打了反革命。不拥护党委的，说党委坏话的打成反革命，思想作风上有问题的，也是反革命，后来为什么一解放了大家很高兴，很拥护毛主席？打成反革命以后又把他们解放了，当然他们拥护了。

毛想把中共党的历史清理一下，是非整理一下，究竟谁对谁错。他想通过这个实践建立一个比人民公社更大的新世界，工农兵学商，五七指示，按照那个纲领搞。他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号给林彪的批示不是偶然的，不是即兴的，是深思熟虑的。八月一号《人民日报》有个社论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大学校”，阐发了他的意见——当然不会成功了，结果越搞越乱，越搞越乱，后来只好真正借重于军队了，支左、支工、支农啊。这样子军队坐大，革委会当头儿的都是军队的了，中央各部委头头也是军人，总后二级部的部长都调到中央当了部长，担任军代表，他还有一个军委办事组，等等。这样军队力量相当的大。所以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苏联说我们是军事官僚专政。”可见他对军队是非常敏感的，说的不好听为非作歹就仗着手上有军队，把军权当作他的命根子。他对这一点非常之警惕，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定了一条，凡是调动一个排以上军队的命令要军委主席批准。

九届二中全会说林彪不听他的话，其实并不是不听他的话，他的话你摸不清楚。毛老人家诡计多端，大事小事他都有计，所以弄不清哪个是计哪个不是计。而且他也不许你弄清楚，谁弄清楚谁倒霉（他自己说《二十四史》看了十四遍。久浸其中，必受影响。举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很小的例子：批判吴晗，耍了多少花招啊？）。五个常委四个主张设国家主席，一个主张不设，主张不设的是毛泽东，主张设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林彪四个常委。

毛主席最早对林彪有意见是一九六七年七二零事件。他发现省军区、人武部都支持保守派。他满肚子火，做了指示：要武装左派，要发一百万支枪。当时上海没发，北航红旗发了，人民日报报道的。他的理论是右派有枪左派没枪那不是吃亏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指示给江青。结果林彪对文化大革命越来越搞不通，他让黄永胜顶中央文革，讲：对中央文革要软顶，不能硬顶。

邱会作说，我一生犯了很多错误，什么错误我都可以承认，就有一条错误我不可能犯，什么错误呢？“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奋斗一生，出生入死，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吗，我颠覆它干吗？”

毛跟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闹分裂。林要发展生产，十大报告说林、陈的报告是“唯生产力论”的报告，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报告。

毛在讲江青的时候说她是过渡性人物，因为她有好多优点，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不动摇，有她的原则性。他是说过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结果一直拖下去了。现在给了别样解释——可见毛的决心之大：横竖都要解决。真是人嘴两张皮，随你怎么说。

毛主席有时候胡思乱想。人老了嘛，跟我们现在的脑子差不多，想这个想那个，另外一天这么长时间也没事，没事看看古书，《二十四史》，再没事就找几个女友来玩玩，打打闹闹的，再没事就算计人，该算计谁啦？“拥护以聂荣臻为代表的……”，拥护你，不拥护我啊？有的书上说他有多疑症、妄想症。处于这样的高位，一点儿也不奇怪。有时候不要以为有那么多大道理在里边。因为都是人，人犯的错他们都会犯。我们心平气和地讲，周恩来是伟大人物吧？可他也做过苟且的事，他昧着良心做苟且的事！他知道事情是怎样的，他偏要那样做。他不知道卜占亚是怎么样的人啊？为了顺从毛的意志不得不这么做，他不这么做自己倒霉。这里并没有多大的道理，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

文化大革命拖拖拉拉、拖拖拉拉的，假如他老人家不去世还结束不了。毛从好的愿望走到愿望的反面，可以讲他不会愿意把中国搞坏吧，不一定吧？可是最后他搞成这个样子，造成的后果到现在还依然存在。

（关于长征中张国焘“武力解决中央”密电）根据历史的考证，说张国焘这个电报有没有证据呢？没有证据，谁也没见到过，是闹了一个笑话。什么笑话呢，沈阳军区空军有个副司令吕黎平，写了一篇回忆录，登在《解放军报》。说他在长征途中（他是作战参谋），没事，散步，走着走着走到机要室，遇到战友了，看到他们正在收电报。收到一份什么电报呢？收到张国焘发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让他们武力消灭中央。他说他把电报送给叶帅，叶帅送给毛主席，所以毛主席夸赞叶：“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我看到这个回忆录以后，大吃一惊：这么大的问题，我们解放军五十年代搞建军三十年征文，全军轰轰烈烈的，大张旗鼓的，还出了好几本丛书，《星火燎原》等，你怎么不投稿啊？

第二个，我怀疑了，就开始查各种档案。什么档案呢？《开除张国焘的决定》，张国焘逃到武汉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答记者问（披露张国焘的罪行），共产国际批判张国焘的电文，新华社社论，《解放日报》的社论等等，都没有这个记载。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请教吕黎平同志：何以这么多历史文献里面一个字都没有记载？你一个作战参谋散步怎么散步到机要室去了？我们都是部队的同志，机要室是能随便散步的吗？文章发表在历史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上。他又发表了一篇（内容我忘记了），我又回了一篇。朱玉帮了大忙，他找到了左路军的电台台长、右路军的电台台长，两位台长写了书面证明：在我任上没有见到张国焘叫徐向前、陈昌浩武力消灭中央的电报，谁要发电报必须经过我台长的手，是指定专人翻译的，所以我们的证明是权威的。右路军电台的台长叫宋侃夫，是全国总工会的副主席，他说：“从来没看到过这份电报。”

还有一个人，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我是在《党史研究资料》上发现的。他参加了这个会议，说张国焘主持会议，让发电报给徐向前、陈昌浩要怎么样怎么样，要大家讨论，大家都不同意，所以最后电报没发成。这人是中央委员一级的人物。

文章发表后，平静了一段。

过了一段时间，叶剑英元帅放了个风：电报还在，就在我这儿，你们要看就来看。我们党史教研室的主任说：“这个老师不像话了，这个电报怎么放在你个人身上？这么几十年了还放在个人身上啊，这不合党的规矩。”（现在这个老同志也去世了，也是老红军。）

后来，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还有有关单位集体给叶剑英打报告：我们

要看那份电报。于是，某年某月某日，大家浩浩荡荡，十个人左右吧，到叶帅那儿去了。大家行礼如仪，秘书进去报告，叶帅出来，坐在客厅当中，“大家来看电报的啊？”等了一会儿，大家不能老等啊，快把电报拿出来啊？老师一会儿掏掏掏，掏出来了，说：“在这儿呢。”大家一看，是吕黎平回忆录，从《解放军报》剪下的这么一块。大家当时想笑也不敢笑：这人老了爱开玩笑啊？你说“电报还在”，这是电报吗？

后来这件事只好作了记录，存档。这是在叶帅去世前一两年。

事情还没有完。给叶帅写传记的某人又写了一篇文章，说怎么没有呢？明明就是有嘛。没有毛主席怎么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说的谁呀，叶帅，说的什么事啊，就是这份秘密电报。

这两句话，毛泽东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的，档案可查。有前言有后语，大意是这样的：叶剑英同志对批判彭德怀是很积极的，最近编了一本书，批彭德怀批的很好，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两句话怎么能安到秘密电报上去？

我们在第二篇文章中披露了，毛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延安批判张国焘的时候有一段话，讲到长征当中的事情，说张国焘要南下彻底解决路线问题，开展党内斗争。是说他要“南下开展党内斗争”，没有说“武力解决中央”。这是第二个证据。

第三个证据，本来毛泽东选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一个注解，说：张国焘有电报，要武力解决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得早，五十年代初，五三年左右）。到后来我们论战开始以后，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把这个注释撤消了，不要了。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那是简单的啊？说取消就取消了？

总之，我们研究历史是很严肃的事情，不能含含糊糊的。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 王年一先生追思会在京举行

2007年9月13日，王年一先生病故。25日，部分王老生前好友和同事在北京举行了旨在研究王年一及其治史思想的追思会，以此表达对他的敬仰和怀念。

会议开始，全体与会者在王年一先生的遗像前肃立默哀。

在会上，大家回顾了王年一先生的学术生涯和各自与他的交往，高度评价了王老的道德风范和学术成就，对他不幸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王年一先生是党史、军史特别是文革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的学术成就举世公认。与会者在发言时谈到，人们尊敬他，不仅因为他治史严谨，学识渊博，更由于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在种种困难、阻力、压力下，他始终怀抱赤子之心，独立思考，秉笔直书，探索真理，呼唤正义。他继承中国自古以来饱受摧残却生生不息的史家风骨，努力摆脱官史思维桎梏，突破一个又一个“历史结论”和“理论禁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特别是表达了对受迫害者、受冤屈者和普通民众悲惨遭遇的深切的人文关怀。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不断校正自己、超越自己，勇于承认自己的失误和局限，这种谦逊的、严肃的、开放的治学态度堪为后人楷模。与会者痛感，他的过早去世给文革史研究带来的损失是无可弥补的。

有与会者认为，王年一是科学研究文革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的《大动乱的年代》是目前最权威的文革通史，得到海内外高度评价。当然，因现实环境的困扰和作者认识的局限，这部著作存在种种缺陷，但它大大拓展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

参加会议的史学工作者一致表示，我们追思王年一先生，最重要的是学习他坚守学术

良知公正记录历史的精神，使他倾尽心血矢志以求的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

追思会由文衡文化发展中心筹办，由李宇锋主持。参加追思会的有：丛进、朱玉、肖冬连、林蕴晖、卢弘、刘家驹、黄春光、邱路光、吴迪、韩钢、丁东、林京耀、阎长贵、郑仲兵、田晓青、李宇锋、王思彤。王年一先生的朋友、学生何蜀、顾训中、萧树祥分别为追思会提交了书面发言。